中澳自贸协定签署效应（下篇）

华商能够抓得住的福利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历时近10年、经过20多轮谈判，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澳大利亚也成为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最大发达经济体。那么，华商究竟能享受到多少实实在在的福利？

福利一：贸易机会越来越多

“去年11月，我就在堪培拉习主席的演讲现场，亲身感受到澳大利亚人对中澳自贸协定签署的热烈期待。”ABC环球集团总裁袁祖文回忆道。

如今，这份期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机遇。

关税减少，是双边贸易中最为“实惠”的一项举措。

在华商付智涛眼里，这为他节省了不少成本。这位年轻的“80后”总裁是做红酒和物流行业的。他说：“拿红酒贸易来说，现在关税递减，成本减少，我个人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对于老百姓来说，协定打破了层层壁垒，他们可以接触更多的澳大利亚产品。”

做电商平台的杨东东也能切实感受到这份协定带来的种种变化。以前出口保健品、日用品等商品到中国，超过500元人民币就要收税。“从今以后，税会减少或者起征额度提高，行业会井喷式发展。”他说。

“依据自贸协议，大部分商品要走出去，可以依靠网上进行销售。”付智涛解读，之前某些中国国内电商线上销售的东西，多是店主在国外开店备货，成本很高。“每天的市场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你不可能以过去的方式来做市场。”

精明的付智涛看出了商机，这些年一直游走于中澳之间，和中国国内企业进行“搭配合作”，“华商可以为国内电商或者大型企业提供配货、发货等第三方服务。”

“其实，一直以来，华商都在做这些业务，只是协定更加明了，对华商更加开放。”付智涛说。

福利二：服务业迎来“黄金时代”

“协定的签署，华商及华人的公司会得到最为直接的实惠。”袁祖文断言。这得到了杨东东和付智涛的认同。“华商是两国商业、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澳华商熟悉中国国内的市场环境，也熟悉澳大利亚当地的市场需求。”杨东东说。

“中澳经贸活动日益频繁，大量资金往来，迫切地呼唤以中国资本为基础的华资银行，来有针对性地服务日益增长的双边贸易。”袁祖文说。

“之所以谈了9年多，就是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有分歧。”付智涛分析，协定打破了这个僵局，“华人开设小型融资公司、华商银行，这些在将来都会实现。”

而另一个直接受益的行业是留学、移民行业。“将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澳大利亚，而这将带给华商服务业更多利润。”付智涛说。

自贸协定中涉及到的“5000个打工及度假签证（462类）”对袁祖文的公司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他的集团长期从事的就是移民、留学业务。“不仅可以分一杯羹，而且还可能短期引进一些优秀的中国毕业生来澳大利亚工作及度假，适度缓解我们因缺乏优秀员工而导致的发展瓶颈问题，进一步协助公司强化中国市场业务。”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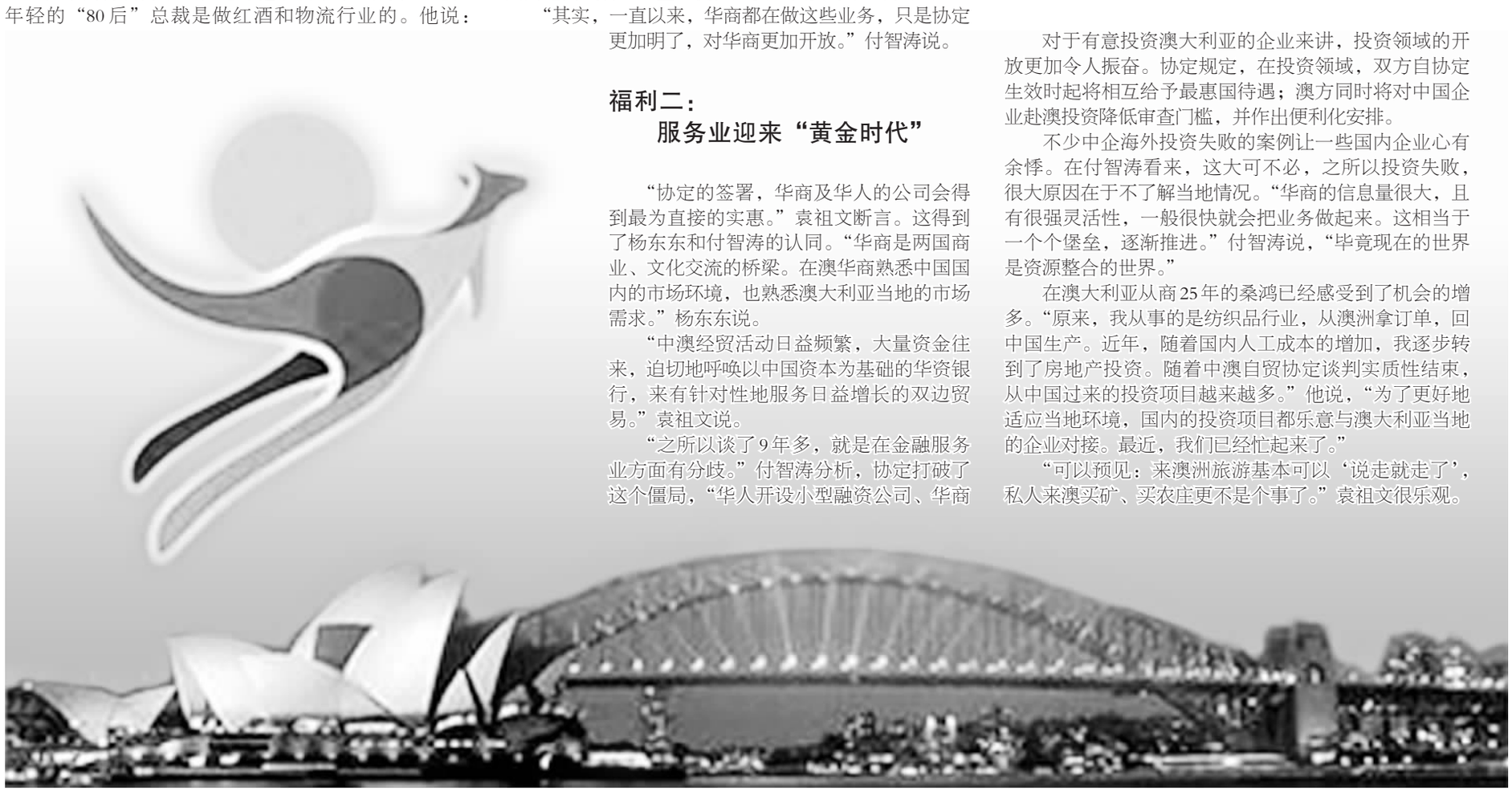
福利三：更便利的投资机会

对于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企业来讲，投资领域的开放更加令人振奋。协定规定，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时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将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

不少中企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让一些国内企业心有余悸。在付智涛看来，这大可不必，之所以投资失败，很大原因在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华商的信息量很大，且有很强灵活性，一般很快就会把业务做起来。这相当于一个个堡垒，逐渐推进。”付智涛说，“毕竟现在的世界是资源整合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从商25年的桑鸿已经感受到了机会的增多。“原来，我从事的是纺织品行业，从澳洲拿订单，回中国生产。近年，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增加，我逐步转到了房地产投资。随着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实质性结束，从中国过来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他说，“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国内的投资项目都乐意与澳大利亚当地的企业对接。最近，我们已经忙起来了。”

“可以预见：来澳洲旅游基本可以‘说走就走了’，私人来澳买矿、买农庄更不是个事了。”袁祖文很乐观。



“龙旋风”席卷全球

李 凡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随着华侨华人在各国的打拼，龙元素也悄然走进各国，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近日，一条上下翻飞的金龙舞进了法国里昂领事节，成为当天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明星。这条来自重庆铜梁的竞技龙活灵活现，演员们用精湛的技巧和丰富的表演套路让金龙栩栩如生。

精彩的舞龙表演像磁石一般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目光和媒体的镜头。一位观众由衷地赞叹：“不看下面的舞龙人，还真觉得是条真龙在翻飞呢！”

6月13日，一座长3米、高2.5米、重约7200公斤的铜制龙雕塑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安家落户。这条象征吉祥、祝福和友谊的“中国龙”来自维多利亚市的姐妹城市苏州，承载着纪念两地结为姐妹城市35周年的美好寓意。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刘菲表示：“今年是中加两国文化交流年，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国龙’落户布查特花园，给这个著名的花园增添了典型的中国元素。”

同样充满龙元素的还有端午节期间的各种龙舟竞赛。随着华人移民遍布全球，赛龙舟已经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北美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节，一年一度的美国波士顿龙舟节于6月14日热闹举行。华侨华人为龙舟点睛，在水中大显身手，欢乐迎端午。

波士顿华人水上赛龙舟，新加坡华人则在陆地展开龙舟对决。6月14日，在“2015年端午节嘉年华会”举办的“趣味旱龙舟竞技大赛”上，参赛者合力踏着旱龙舟，高喊节奏，齐步向前迈进，场面十分热闹。

中国龙不仅可以舞于空中、游在水上、陆地行走，还可以在晚上发出耀眼光芒。在去年的美国达拉斯地区彩灯节园区，主办方用1.5万个瓷盘瓷碗瓷碟瓷球嵌砌捆扎，精心打造了一条百米青花瓷长龙。夜幕降临时，技术工人使用灯光让巨龙龙身呈宝蓝色，仙气环绕。又如神龙出海，威武挺拔。参观者看到无不啧啧称赞。

龙，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国精神的代表。舞龙、雕塑龙、龙舟、旱龙舟、瓷器龙……一条条巨龙在世界各地舞动，也让中国文化在全球熠熠生辉。

加拿大华人入籍门槛抬高

龚欣怡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调查显示，在过去15年里，中国一直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来源国之一。对不少人来说，拿到枫叶卡后，下一步都希望能申请入籍，成为加国公民。而随着新入籍法的全面实施，他们或将面临入籍难题。

入籍今变难

日前，加拿大联邦移民局宣布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入籍法。新入籍法将全面调整公民入籍政策法规，其中包括延长申请入籍所需居留时间，扩大需要达到语言要求的年龄段，增加申请个人所得税文件等条款。这都标志着加拿大政府开始抬高入籍门槛。

在数量庞大的加拿大华人群体中，新入籍法自然备受瞩目。此前，加拿大一家中文网络媒体曾就此做过民调，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的投票人认为新入籍法是合理的，有2/3的华裔投票人表示反对。不少华人认为，新入籍法增加了华人入籍的难度。

有分析指出，问题可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入籍法对申请人的语言水平要求提高了，而且免试的年龄也由55岁提高至65岁。另一方面，新入籍法对申请人的居留时间要求也更为严格，由原来的4年内住满3年变为6年内住满4年，并且将“居留”明确定义为在加拿大境内“实际居住”，这必然会影响一些工作重心仍在中国的华人。

应对各不同

面对入籍难度的增加，打算申请入籍的华人反应各有不同。

目前正准备申请入籍的加拿大华人廖康健就面临着语言难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廖康健说：“我在加拿大的工作主要还是和中国人打交道，英语虽然蹩脚，但和当地人沟通还是没问题的。现在，为了拿公民身份，还要再从头学abc。”他说，如果实在过不了英语关，就只好放弃入籍了。

同样在等待公民身份的黄琳在加拿大已经快满3年了。她告诉本报，移民局突然宣布从6月11日开始全面实施新入籍法，使她没能赶上旧入籍法的“末班车”，不得不根据新入籍法在加拿大多待一年。“现在只能在这边继续熬身份了。”黄琳显得十分无奈。

不过，对一些原本就打算在加拿大落地生根的华人来说，新入籍法的影响并不大。跟随父母一起移民到温哥华的周薇目前正在上大学，她表示，父母已经在加拿大定居，自己大学毕业以后也打算在加拿大找工作，申请入籍不过就是晚一年的事。

移民试金石

新法案从出台就遭受华人群体的非议，不过也有不同意见。已经取得加国公民身份的马炜先生认为，新入籍法如今成了一块试金石。

“新入籍法出台后，可以投机取巧的地方少了，耗费的时间、精力却更多，这会促使人们反思是否非拿加国护照不可。”马炜说，“身边有些朋友，都是一边想要加国的身份，一边又舍不得在国内的发展，两头折腾得够呛。现在新法案一出台，不少人都打算先放弃入籍，安安心心在国内发展。”

不过，马炜也认为，对于打算在加拿大长期发展的华人，还是应该尽量争取得到公民身份。“这关系到一个选举权问题。没有公民身份，就没有投票权，华人的影响力只会更弱，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件只会更无能为力。”

马炜说，希望加拿大华人能正视入籍，不要盲目跟风，急于得到一块好山好水的“护身符”。“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是华人在加国的一个机遇。我们既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承担责任，也要利用好身份，为华人争取更大的权利。”他说。

华侨华人项目成果在福建落地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举行海外华侨华人项目成果签约仪式。当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华侨华人项目成果展亮相福州。展会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名海外专业人士参会，其中院士1人，博士45人，征集海外科技成果225项。截至目前，已成功推荐13个海外项目与福建省的企事业单位对接，总投资额约11.9亿元人民币。图为签约现场。

张 斌摄 中新社发

闯荡非洲政坛的华裔女子

许林贵 王 悦

在非洲政坛上很少见到华裔面孔，华裔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但津巴布韦第三代华人费琼却是其中之一。

已过花甲之年的费琼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曾任津巴布韦两任内阁部长，主管教育和就业。退出政坛后，她先在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任教育小组主席，后在埃塞俄比亚任非洲联盟（“非盟”）高级顾问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能力建设研究院首任主席。迄今，非洲华裔中除了非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很少有人在政坛的建树能与她相比。

非盟第25届首脑会议6月14日至15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讨论妇女赋权等议题。非洲政坛直到不久前还是“男人一统天下”，女性尤其是华裔女性在政坛开疆拓土的艰辛，作为非洲参政女性先驱的费琼深有感触。

“小时候，受传统观念和种族隔离制度影响，女孩上学非常困难。好在父亲非常开明，费尽周折要把3个女儿送进学校，是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费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和大多数中国移民家庭不同，来非洲前，我家人在政治上就很活跃。在这里扎下根后，自然很同情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同胞，想做点什么。父亲在哈拉雷城里开的面包店后来就成为民族解放运动成员开会的据点。”

费琼祖父朱箕奎是来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前身）的第一批中国人。1896年，他与13名广东台山老乡远渡重洋营生，在索尔兹伯里（哈拉雷前身）落脚。费琼的父亲朱耀宗17岁来非洲投奔父亲，最早在宾度拉一带从事金矿、鞋厂和面包店生意，1936年成家后回到索尔兹伯里。

费琼说，她3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里“香火不断”的观念比较重，导致母亲连年生育、最后难产而死。母亲死后，父亲忙于照料生意，费琼和她的两个妹妹由黑人保姆照顾。因为失去了妈妈，黑人保姆在姊妹3个的生活中时常扮演母亲角色。费琼说，这段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华人与当地人一家亲的种子。

从政这些年，费琼一直相信政府财政大力投入教育医疗等行业并扶持国有企业发展是津巴布韦走上工业化的最佳办法。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津巴布韦独立后依然过度依赖西方每年2亿至4亿美元的援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调整计划，大刀阔斧地搞私有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但刚独立的津巴布韦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导致本地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物资依靠进口而物价高企，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

“津巴布韦要学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早些年，中国在最困难时期不靠外国援助也发展起来了，中国充分利用了这段时期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费琼说。

谈到当下中非之间的产能合作，费琼说，中国与非洲进行的广泛经贸合作，包括扶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富余产能向非洲转移等政策，给了非洲国家一个摆脱西方“新殖民主义”束缚的难得机会。非洲各国政府应当把握时机，调整扶持政策，加大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以从中非产能合作中最大受益。（据新华社电）